

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和新世界史的构建

包 茂 红

“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就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说明世界史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同样，世界史体系也不是一直就有的，它既是历史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也是随着世界史和历史认识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在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面临的问题与二十世纪已有很大区别的时候，我们需要构建新的世界史体系。在国际史学界，无论是“大历史”、“新世界史”、还是“全球史”或“深度绿化的世界体系史”等新探索，都表现出重视环境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新取向。在日本历史学界，除了文明论研究者把研究重点转向环境以及人类学家开始探索地球环境史之外⁽¹⁾，以羽田正教授为首的历史学家也开始探索构建把环境史纳入其中的新世界史体系。在中国，探索新世界史体系的讨论方兴未艾，但真正把环境作为世界史的基本内容来考虑的著作几乎没有，另外，中国的环境史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尽管如此，还是有学者提出要以环境史的新思维来重新认识和构建世界史的设想。

一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中国古代，人们没有世界的概念，只有天下的意识。中央王朝所在地是天下的中心，周围是附庸的夷狄。尽管如此，当时历史学家目力所及不过是欧亚大陆之东部一隅。当西方传教士到达中国后，中国人才逐渐接受了西方关于世界的早期认识，随后的一系列殖民战争迫使中国人必须开眼向洋看世界。但是，中国人对世界史的认识并没有与对世界的

认识同步，只是到了晚清，才有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后来陆续出现了王韬、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法国志略》、《日本国志》、《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等著作。显然，这时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别史，其选题是现实需要的结果。不过，本时期及其稍后有两位学者的努力值得重新认识，一位是复旦大学的周谷城，一位是西南联大和后来南开大学的雷海宗。

文化形态学或历史形态学传入中国后，1940-41年云集昆明的雷海宗等人迅速在《战国策》半月刊和《大公报》的《战国》副刊上发表文章，对它进行讨论并加以中国化，并在1946年出版了《文化形态史观》一书⁽²⁾。他们认为，文明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每个文明都是有机体，经历了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几个阶段，世界文明的发展是等价的、平行的、多样的。雷海宗关于世界文明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他的关于世界古代史的讲义中⁽³⁾。从这本讲义中可以看出，雷海宗不光打破了以国别为单位讲授世界古代史的先例、改为以时间断代观察古代文明的发生和发展，还非常关注环境在古代文明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上古世界有五个重要的文明地区，其中四个（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与希腊罗马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是河流文化，大河环境对生产发展和国家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而希腊山地、海岛、港湾的存在使之易于形成建立在手工业基础上的城邦；罗马因存在平原和海岸线平直而注重农牧业，走出了与希腊不同的历史轨迹。在草原沙漠地区，只能以畜牧或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游牧世界不可能发展出奴隶社会，但可能出现家内奴隶；在大河流域，地广人多，可以形成奴隶社会，但既不会高度发展，也不会延续很长时间；在邻海地区，工商业发达，适合奴隶社会发展⁽⁴⁾。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史学界也引起共鸣。周谷城于1939年提出了“历史完形论”，认为历史是一个复杂统一的整体，各部分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研究历史就是要研究它的全面、完整的形态，而不能把它弄得支离破碎或四分五裂。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在多次讲授世界史的基础上于1949年出版了三卷本《世界通史》。他认为，世界史不是国别史的总和，要着重研究世界各国的相互关系，

突出它的有机统一的整体性。世界史还是人类史和自然史的有机整体。人类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从产生了人类，人类就与自然相互影响、相互利用、相互制约、相互进化、交错发展。人类离不开自然，人类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的进化。因此，在他的《世界通史》中，世界不同文化多元并存，相互渗透，共同发展。但所有这些都是宇宙的进化、地球的进化、生物的进化和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中发生的，是自然与人类相互作用的产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民国或解放初，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在构筑自己的世界史体系的时候，并没有忽视环境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是这种情况在全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后发生了彻底变化。苏联科学院编撰的《世界通史》以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试图把所有国别史都纳入五种生产方式的演进中来。以此为范本，中国大学的世界史教学和世界史研究全面转向苏联式马克思主义并进一步革命化。

从1952年到1980年代中期，在中国史学界影响最大的世界史著作是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这套书借鉴了苏联《世界通史》的编撰框架和叙事模式，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的推动力，以五种生产方式的升级为历史前进的方向，具有非常典型的目的性。但是，这种历史编撰法存在明显的问题。第一，五种生产方式是从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是否适合全世界的历史发展还不能确定。第二，这部世界史中没有中国史的内容，似乎中国不属于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世界史只能是外国史。第三，这部世界史根本没有述及环境在历史上的作用。为什么苏联和中国的世界通史都不再关注环境的作用呢？关键在于历史编撰受到了当时政治气候的严重影响。在冷战的格局中，社会主义阵营希望千方百计发展得快一点，甚至幻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于是，不顾一切地利用和改造环境被看成是进步的表现。在苏联，斯大林认为环境是无用的，因为环境千百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苏联已经经历了五种社会制度。同时，对环境决定论形成了猛烈抨击，认为它不但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的历史能动性，而且过分夸大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在中国，毛泽东把斯大林关于环境的思

想与他的诗人气质相结合，提出了“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人定胜天”等革命浪漫主义思想。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环境自然就会被排挤出世界史。

此后的中国世界史编撰虽然随着改革开放而逐渐出现多元化的趋向，如纵向与横向结合的世界史体系、现代化的世界史体系、世界文明史体系等，但是，环境依然没有进入历史，人仍然是脱离了自然界的社會人。这种情况直到进入21世纪后才发生改变。如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工程”之世界历史，其近代卷和现代卷都设专章叙述环境问题和环境主义运动；正在得到大力提倡和尝试的全球史也非常重视历史上的物种交流和环境变迁。但遗憾的是，在中国至今仍未见到完整的、已经出版的融合了环境的新世界史著作。不过，在近年来翻译出版的两部大型世界史著作中，环境的内容有较大幅度增加。第一部是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⁵⁾，第二部是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的《世界：一部历史》⁽⁶⁾。前者从跨文化互动的视角分析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涉及人口、物种、疾病的交流和环境恶化等。后者明确指出，世界史就是探讨世界如何呈现现在的面貌，是对世界的整体叙述。其两大主题之一就是环境史，研究人类与人类之外的自然界——其他物种、不稳定的自然环境和动态的地球——的交互作用。正是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从根本上构成了世界史，因为我们无法脱离环境来理解我们自身的历史。这并不是说环境决定着我们的行为和生活，但是环境的确为我们的行动设定了界限。由此可以看出，作者重视环境在历史上的作用，但也极力避免陷入“环境决定论”。这两部书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得到及时翻译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满足了中国读者的需要——呼唤世界史为理解当前的世界状况和预言人类与地球的命运提供历史知识和解释。

总之，在中国的世界史编撰中，最先尚有环境内容，后来就完全没有环境的内容，这种变化的发生与当时的时代精神密切相关。当世界和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威胁到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的时候，时代呼唤包括环境在内的新型世界史的出现。中国开始引进国外的融合了环境史研究成果的新世界史。那么，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如何呢？是否为编撰新型世界史做好了知识储备？

二 中国的环境史研究

作为一个学术名词,“环境史”一词毫无疑问是舶来品⁽⁷⁾。早在1990年代,中国学者就著文介绍了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和环境思想史。笔者从1995年开始在德国学习环境史,4年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开出了名为“人类发展与环境变迁”、实为“简明世界环境史”的本科生选修课,以后还相继建设了研究生课程,如“南非环境史研究”、“亚太区域环境史”、“环境史学史”、“环境史文献选读”,设立了“环境史前沿系列讲座”。2000年发表了《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的论文,比较系统地研究和介绍国外的环境史研究,提出了中国学者对环境史的解释以及环境史理论有助于改造和构建新世界史的观点。此后陆续有许多学者以环境史来命名自己的论文或者自觉地把自已的相关论文归入环境史的范畴之内。尽管中国的环境史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首先,中国环境史研究发展迅猛。在环境思想文化、农业环境史、古代城市环境史、自然景观变迁史、疾病史、灾荒史、西部环境史、森林和环境保护史等方面不断推进,做出了大量研究成果⁽⁸⁾。但是,中国环境史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从横向来看,国内的区域研究比较发达,也形成了一些以区域为依托的研究中心,但是缺乏全国性的和跨国性的视野,至今仍没有写出像《象之退隐》这样的宏大叙事性著作,也没有像日本综合环境学研究所那样的把云南置于季风亚洲、把伊犁置于欧亚大陆、把黑龙江置于东北亚及其海域的跨界研究成果,更没有把中国环境史的专题研究置于国际相关学科研究的谱系中进行定位和推进的意识。从纵向来看,中国环境史研究重古轻今,在古代环境史研究中惯于沿用王朝更替的历史分期法。中国历史学的一个传统就是后朝修前朝史,喜欢盖棺论定,认为这样可以在撰史时更超脱和客观,研究内容和规范更具学术性,而当代人修当代史容易受到现实影响,不易秉笔直书。中国的环境史研究也不例外。但是,这种历史编撰因仍然沉陷在传统官僚政治史的窠臼中而忽略了环境与人类相互作用的历史

变迁的规律、因忽略了对当前环境危机的直接基础的研究而不易发挥环境史的警世和资鉴作用。

其次，中国的世界环境史研究就像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一样薄弱。迄今为止，总共出版了两本外国环境史专著⁽⁹⁾，两本论文集⁽¹⁰⁾。在外国环境史研究方面，与整个中国世界史研究的风气相一致，就是重视对强国或大国的环境史和大国主导的国际环境治理体系的研究。美国、英国、日本是研究的重点，涉及其环境主义思想史、环境保护运动史、污染治理和环境政策史、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和治理的关系史等内容。相对来说，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史的研究实属凤毛麟角。对外国环境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环境史的经验教训的需求，为进行国际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但无论是从世界环境史是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环境史是其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学术要求，还是从在当今国际环境斗争中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支持的现实需要来看，仅仅关注发达国家环境史这种失衡情况都必须迅速加以改变。国内研究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译介来弥补。近年来，中国学者先后翻译出版了外国环境史书籍大约20部⁽¹¹⁾。从这些著作的作者来看，几乎都出身于欧美发达国家，但反映的内容绝不局限于欧美，其中许多著作具有全球视野，梅棹忠夫的著作还尝试颠覆欧洲中心论，为以后日本文明论的环境史观的出现开辟了道路⁽¹²⁾。这些译著为向中国的世界史教学和研究注入环境史的内容提供了方便，为拓宽中国世界史编撰者的视野提供了知识基础。

再次，尽管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但中国学者有意识地进行了环境史的理论 and 史学史的探索。学者们就环境史的定义、环境史在中国的起源、环境史的理论基础、环境史的功能等展开了讨论。尽管提出的观点五花八门、从国际水平来看有些甚至是“炒冷饭”，但对在中国普及环境史的学科知识、提升历史学界和普通大众对环境史的认同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积极总结世界环境史学史，希冀在做研究和指导研究生时能直接进入国际环境史研究的最前沿，实现环境史研究的跨越式发展。然而，一个中国学者要刻画和总

结世界不同国家的环境史研究走过的轨迹，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可想而知。不过，当代历史学研究的新发展为我们提供了相对比较成熟的口述史学方法⁽¹³⁾，现代传媒技术又迅速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并保证了信息的真实性，于是，采用文献分析、口述史学和实地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世界环境史学史不但成为可能而且可以成为晚起步环境史学家进入国际环境史学界的突破口⁽¹⁴⁾。对世界环境史学史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全面准确掌握环境史的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为在世界史中融入环境史或用环境史的新思维来重构世界史提供了知识基础。另外，近年来，中国学者也相继邀请许多著名的环境史学家到中国来访问讲学，我以“环境史前沿系列讲座”为名先后邀请了 John McNeill, Martin Melosi, Joachim Radkau, Sing Chew, 井上坚太郎、崔德卿等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交流，他们带来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让我们似乎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不同国家环境史研究的魅力和特点，为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环境史提供了良好的参照。

总之，中国的环境史研究虽然发展很快，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理论基础薄弱、重古轻今、重中国轻世界等亟待克服的问题。但是，翻译和研究并举、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齐头并进的策略使之能够为建构新世界史提供一定支持，从环境史的视角把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并不是没有希望的。那么，环境史究竟能为构建新世界史提供什么支持呢？

三 环境史对于构建新世界史的意义

环境史研究的是人及其社会与自然的其他部分的历史关系。理解这个定义，需要注意两点：第一，这里所讲的人既是自然的和个体的人，也是群体的和社会的人。以前的历史研究强调历史是人的历史，过分强调人的社会性，忽视了人是自然界一部分的生物属性；深度生态学兴起后，过分强调了人的生物性，把他等同于一般生物，忽视了人不同于一般生物的社会性。其实，人是自然界的一员，但是特殊的一员。其特殊性集中表现在他的社会性上，但不能特殊到不顾他的生

物性的地步。第二，这里之所以要强调“自然的其他部分”，是因为其中包含着整体论和有机论的思想。整体论把人和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反对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二元论和还原论的思想。有机论把地球看成一个由各个不同部分的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不但有机地（不是机械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各自都具有内在价值，缺一不可。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不是相对于人的价值，不等于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 value）。因此，环境史既不是简单地以人为中心的，也不是完全以生态为中心的，而是以人及其社会与自然的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为中心的。

环境史可以分为两类，即狭义的环境史和广义的环境史。狭义环境史就是在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框架下把历史研究中缺少的部分补回来。广义环境史是在历史发生的主体从人变为人与环境的前提下重新认识和结构新型的历史。历史不仅仅是人创造的，参与创造历史的或者说出演历史这幕大戏的，还有其他因素如自然。既然是人与自然的其他部分相互作用，那么为什么只承认人而不承认自然的历史创造作用呢？进而言之，脑科学研究发现，人的行动很大一部分是直觉而不是理性指导的，并不是有意识的结果。这个直觉在很大程度上是动物性的，不是人所特有的。那么，为什么人的直觉可以创造历史，而动物的直觉就不能创造历史呢？美国环境史学家克罗农指出：“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大的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¹⁵⁾反过来，如果我们期盼要写出全面的、整体性的历史，我们就不能仅仅认为是人在创造历史，还必须承认自然的其他部分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因此，环境史研究创造的种种知识已然超出了原来的知识边疆，改变了我们的基本历史思维，为我们带来新型的历史。

具体而言，如果把环境史研究看做一个伞形结构，那么一般情况下它应该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环境的演变过程。这里讲的环境的演变过程不是自然史里面所讲的环境变迁，而是比较偏重于在人的作用下的环境演变。由于这方面的内容在传统的历史资料中记载比较少，加之也不能忽略环境的功能及其运行机制，

因此,研究这一方面的内容必须利用自然科学的证据和方法。第二部分是经济或物质环境史。它强调人类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工具技术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在美国的环境史研究中,在这一领域形成了农业生态史和城市环境史两种不同的模式。如何跨越这两者之间的鸿沟是环境史学家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第三部分是政治环境史。主要研究权力关系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以及由环境问题引起的政治变化。例如,集权制和分权制对环境产生的不同影响,国会中关于环境立法的争论,还有环境主义运动以及绿党政治等。这一部分是环境史兴起的时候研究最多的一部分。第四部分就是文化或知识环境史。主要研究人类如何感知环境,这种认识反过来又是如何影响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和利用的。其中研究最多的恐怕要算对宗教环境文化的认识了。这四个部分虽然研究的重点不同,但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研究框架,即环境、经济、政治和文化四维结构。这个四维结构具有共同的特点,如都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不但包括人对环境的作用,还包括环境对人的作用;都注重不同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等。

在国际学术界,用环境史改造世界史的尝试已经开始。正在构建的新型世界史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世界史(World History)”。它又可以分成两个流派,一个是本特利(Jerry H. Bentley)倡导的流派,另一个是麦克尼尔父子所代表的流派。老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研究以人为世的世界史,但也关注环境史的课题。小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本身就是一位著名的环境史学家,他的研究内容遍及除西亚之外的整个世界。他们父子合写的《人类网络》(*The Human Web*)一书中就包含了许多环境史内容和环境史的思维⁽¹⁶⁾。本特利的著作中涉及环境史的内容相对比较,但在我和他交谈以及通信中,他都说他已经意识到这个新思维,但在没有得到圆满解释和普遍承认时还不宜写入通史中。在2009年的“北京论坛”上,他发表了有关环境史的宏观研究成果⁽¹⁷⁾。第二类是“大历史”,其代表人物是Fred Spier和David Christian⁽¹⁸⁾。他们撰写的历史是自137亿年前发生的“大爆炸”(The Big Bang)以来的历史,实际上就是

宇宙和地球这颗行星的历史。如果假定宇宙的历史开始于13年前，那么人类的存在不过只有53分钟，农业社会仅存在了5分钟，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只有6秒钟。历史研究视角的变化一定会带来历史认识的变化，会让我们发现在整个地球的演变过程中人类的历史其实很短暂、很渺小。“大历史”的出现可能会对解决全球环境问题贡献出新的思路和智慧。第三类是全球史（Global History）。这里所讲的不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而是 Bruce Mazlish 所代表的全球史。它的核心概念就是全球主义，比较注重第三世界的历史和全球环境问题，企图用全球主义来统领全球史。但是，在本特利看来，Mazlish 只是编著了一本名为 *Conceptualizing Global History* 的论文集，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思考和设想，但是尚未写出贯穿了他的基本思想的、成体系的全球史著作。不过，彭慕兰最近在全球环境史方面颇有斩获⁽¹⁹⁾。第四类是“世界体系史”。我们熟知的是沃勒斯坦的500年的世界体系理论，不过，秉持这一理论的阵营发生了分化，以弗兰克等人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构建了一个五千年的世界体系。前一个世界体系是特定的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而后一个世界体系更多的是地理学上的概念，几近于我们现在所讲的全球史。5000年的世界体系理论分为两个流派，一个是弗兰克代表的、基本上是以人为中心的5000年世界体系。他认为，世界经济和体系并非独立于生态系统或宇宙之外，二者确实有互动关系，有必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但可惜的是尚缺乏足够的概念资源对此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²⁰⁾。另一派是以环境为基本出发点来编织世界体系的，其代表人物是周新钟（Sing C. Chew），他已经出版了构筑其体系的三部曲，对5000年的世界体系进行了深度绿化⁽²¹⁾。

从环境史的本质和前述初步实践可以发现，环境史能为结构新世界史提供新的视角、思维和工具，可以帮助克服先前世界史编撰中的一些难点。第一，环境史可以帮助从根本上克服世界史编撰中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环境史研究的是人与环境其它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不把环境其它部分作为历史的主体来叙述的世界史肯定是不完整的历史。从时间跨度上看，如果接受“大历史”

的思维，那么原先世界史中大书特书的人类历史只能是历史的一瞬间，原来我们对历史的狭隘自大态度和认识就应该彻底扭转过来。

第二，环境史可以帮助校正进步史观的缺陷。进步史观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在一定程度上是欧洲中心论和东方学的同谋共犯。环境史强调环境各因素的内在价值，以此可以证明世界不同文明存在的合理性。从环境史的思维出发，文明的优越性并不完全在于先前人们熟知的欧洲人确立的那些标准，相反在于是否与它所生存的环境和谐适应。从这个意义上看，欧美文明并不一定像原来约定俗成的那样，就比非洲等地的文明高明。

第三，环境史有助于突破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来编撰世界史的瓶颈。先前的世界史或全球史尽管都声称要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甚至要从月球看地球，但其实都无法摆脱民族国家的束缚，最终变成几个主要国家历史的拼盘。环境史讲求整体论和有机论，强调环境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在环境史中，对任何一个问题的认识都可以从生境、生态区、全球环境等层次展开，民族国家将不再成为阻隔历史认识的樊篱。

第四，环境史可以帮助世界史把人类社会与环境变迁的规律统一起来。传统的世界史编撰要么着眼于五种生产方式演变，要么就以不同文明的相互交往为重点；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完全分离，人类社会独大而自然环境几乎无用。但是，现代环境主义运动和环境史的新进展都告诉我们，人类及其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供养我们的地球环境，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最终只能服从于自然规律。从环境史中可以发现，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类社会都经历着复杂性和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其最重要的动力来自于人类采集和传播信息能力的增强，而隐藏在此之后发挥作用的是能量流动的热力学定律。

总之，无论把环境史研究看成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还是多学科研究领域，它最本质的贡献只能是提供一种新的历史思维。这种思维有助于反思传统的历史本体论和认识论，有助于认识先前世界史编撰的问题和缺陷，进而有利于结构新的世界史。尽管现在仍没有出现按这种新思维结构的、令人满意的世界史，但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新世界史一定会出现。

中国的世界史和环境史研究都起步晚，但世界史编撰受到时代剧烈变迁的影响较大，其中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就在于环境在世界史中的地位的变化；环境史研究虽然是在相对比较安定和开放的国际背景中进行的，但中国的历史研究的固有特点也在其中展露无遗。如果中国要顺应国际世界史编撰的潮流，我们就必须承认，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尚不足以提供充实的知识积累和思想准备。但是，知识是无国界的，国际环境史研究已经为构建新世界史昭示了方向和美好前景。中国年轻的世界史和环境史学家通过广泛的国际学术合作也可以参与到创造新世界史的时代潮流中来。

- 1 梅原猛、伊東俊太郎、安田喜憲總編集，講座「文明と環境」，第1-15巻，朝倉書店，1995-6年。安田喜憲，「文明の環境史観」，中央公論新社，2004年。池谷和信（編集），「地球環境史からの問い ヒトと自然の共生とは何か」，岩波書店，2009年。
- 2 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大东书局，1946年。
- 3 雷海宗，《世界上古史讲义》，1953年油印本。后由王敦书整理，以《西洋古代史纲要》为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1年正式出版。
- 4 王敦书，《雷海宗的环境史观和环境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二期。
- 5 Jerry Bentley, Herbert Ziegler, *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 3rd edition,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2005. 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魏凤莲，张颖，白玉广译，《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 6 Felipe Fernandez-Armesto, *The World: A History*, 2nd edition, Pearson Education Asia Limited, 2003. 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著，叶建军，庆学先等译，《世界：一部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 7 这并不否认，中国在此之前已有比较丰富的、没有称为环境史的环境史研究内容和成果。
- 8 参看 Bao Maoho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China",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10, No.4;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China(2002-2007)",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Pusan, South Korea), Vol.3, August 2007.

- 9 侯文蕙,《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东方出版社,1995年。包茂红,《森林与发展——菲律宾森林滥伐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年。
- 10 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包茂红著,北川秀树 監訳,『中国の環境ガバナンスと東北アジアの環境協力』,はる書房,2009年。
- 11 弗·卡特,汤姆·戴尔,《表土与人类文明》(*Topsoil and civilization*),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古迪 著,郑锡荣等译,《人类影响——在环境变化中人的作用》(*The Human Impact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年。卡若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The Death of Nature*),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菲利普·沙别科夫著,周律、张建发等译,《滚滚绿色浪潮——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A Fierce Green Fire: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斯蒂芬·J·派因,《火之简史》(*Fire: A Brief History*),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Donald Worster, 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商务印书馆,1999年。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Clive Ponting, 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ollapse of Great Civilization*),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唐纳德·沃斯特,《尘暴:1930年代的美国南部大平原》(*Dust Bowl: The Southern Plains in the 1930's*),读书·新知·生活三联书店,2003年。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Joachim Radkau, Natur und Macht: Eine Weltgeschichte der Umwelt*),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Alfred W.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人类能源史——危机与希望》(*Children of the Sun: A History of Humanity's Unappeasable Appetite for Energy*),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ll or Succeed*),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威廉·H·麦克尼尔 著,余新忠,毕会成 译,《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布赖恩·费根 著,《洪水、饥谨与帝王:厄尔尼诺与文明兴衰》(*Floods, Famine, and Emperors: El Niño and the Fate of*

- Civilization*),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年。梅棹忠夫 著, 王子今 译, 《文明的生态史观》(「文明の生態史観序説」), 上海三联书店, 1988年。威廉·贝纳特, 彼得·寇茨 著, 包茂红 译, 《环境与历史: 美国和非驯化自然的比较》(*Environment and History: The Taming of Nature in the USA and South Africa*), 译林出版社, 2008年。
- 12 包茂红, 《日本文明论的环境史观》,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年1月28日。
- 13 我本人先后发表了对多位国际著名环境史学家的访谈录, 这比美国 *Environmental History* 发表类似访谈至少早4年。如《唐纳德·沃斯特 (Donald Worster) 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中国环境史研究: 伊懋可 (Mark Elvin) 教授访谈》,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期;《热纳维耶芙·马萨-吉波 (Geneviève Massard Guilbaud) 教授谈法国环境史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马丁·麦乐西 (Martin Melosi) 与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4期;《亚克西姆·纳得考 (Joachim Radkau) 教授谈德国环境史研究》, 《史学月刊》2004年第10期;《一个巴西环境史学家的拉美环境史研究体验》, 《学术研究》, 2009年第6期。
- 14 仅我本人发表的相关论文就有:《环境史: 历史、理论与方法》, 《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非洲史研究的新视野——环境史》, 《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南非环境史研究概述》, 《西亚非洲》2002年第2期;《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 《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英国的环境史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期;《东南亚环境史研究述评》, 《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4期;《澳大利亚的环境史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 2009年第2期;《拉丁美洲环境史研究》, 《学术研究》, 2009年第6期;《国际环境史研究的新动向》, 《南开学报》, 2010年第1期;《印度的环境史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 2010年第3期。
- 15 W. Cronon, "The Us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Vol.17, No.3 (1993), P.18.
- 16 J. R. McNeill & William H. McNeill, *The Human Web: 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
- 17 Jerry Bentley, "Why study world history?", *World History Connected*, Vol.5, No.1, 2008. Jerry Bentley, "Environmental crises in World history", *Beijing Forum*, November 6, 2009.
- 18 Fred Spier, *The Structure of Big History: From the Big Bang until Today*,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6. David Christian, *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 19 Edmund Burke III and Kenneth Pomeranz (eds.), *The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 20 A. Frank & B. Gills (eds.), *The World System, 500 Years or 5000 ?* London, 1993. A · 弗兰克著, 刘北成译, 《白银资本 : 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年, 第16页。(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 21 Sing C. Chew, *World Ecological Degradation: Accum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Deforestation 3000 B. C.-A. D. 2000*, Altamira Press, 2001; *The Recurring Dark Ages: Ecological Stress, Climate Changes, and System Transformation*, Altamira Press, 2007; *Ecological Futures: What History can teach Us?* Altamira Press, 2008.

中国の環境史研究と新世界史の構築

包 茂紅 (大野公賀訳)

“世界史は過去から現在まで常に世界史という形で存在していた訳ではなく、世界史としての歴史は結果である。”これは、世界史とは歴史が一定の段階にまで発展した結果であることを述べたものである。同様に、世界史システムもまた常に世界システムとして存在していた訳ではなく、歴史認識が一定の段階にまで発展した結果である。世界史システムはまた、世界史と歴史認識が変化するにつれ、絶えず変化している。21世紀に入った現在、人類の直面する問題は20世紀とは明らかに異なっている。我々は今、新しい世界史システムを構築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国際史学界では“ビッグヒストリー”や“新しい世界史”，あるいは“地球全史”，“生態学の視点から見た世界システム史”など、新たな探究がなされている。これらの新たな探求では全般的に、歴史において環境の果たした役割の重視という、新たな傾向が見られる。日本の史学界では、文明論学者が研究の重点を環境に置き、また人類学者が地球環境史の模索を始めているが⁽¹⁾、その他には羽田正教授をはじめとする歴史学者もまた、環境史を取りこんだ新しい世界史システムの構築を模索している。中国では、新しい世界史システムに関する議論は、今まさに盛んになりつつある。しかし、環境を真に世界史の基本内容として認識し、考察した著作はほとんど見られない。加えて、中国の環境史研究は依然として初歩的段階にある。しかし、それでも尚、環境史という新たな思索を通じて、世界史の再認識と再構築を目指す学者もいるのである。

一 中国の世界史研究

中国の世界史研究は、ゼロから始まった。古代中国では、人々に世界という概念は無く、ただ天下という意識だけがあった。中央王朝の所在地が天下の中心であり、周囲は王朝に従属する夷狄であった。いずれにしても、当時の歴史学者が注目したのは、ユーラシア大陸の東部の一隅だけであった。西洋の宣教師が中国に来て、中国人は初めて、そして次第に、初期の西洋の世界認識を受け入れるようになった。中国人が海外に意識を向け、世界を認識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その後の一連の殖民戦争による。しかし中国人の世界史認識は、その世界認識と同様な速度で進んだ訳ではない。清朝末期に、ようやく魏源『海国図志』が執筆された。その後、王韜や黄遵憲、康有為、梁啓超らが陸続と『法国志略』、『日本国志』、『^{ロシアビョートル}俄彼得変政記』、『日本変政考』などを著述した。当時の中国の世界史研究は明らかに、かなりの程度まで国別史であり、研究テーマは現実的な必要性に基づいて定められた。しかし、当時ならびにその少し後の二名の学者の努力は現在、改めて認識するに値する。一名は復旦大学の周谷城であり、もう一名は西南連合大学および後の南開大学の雷海宗である。

文化形態学あるいは歴史形態学が中国に伝わると、1940-1941年に昆明に雲集していた雷海宗らはすぐに『戦国策』半月刊および『大公報』の『戦国』副刊に文章を発表し、これらの学問について議論し、また中国の文脈に合うように手を加え、1946年に『文化形態史観』を出版した⁽²⁾。彼らは、文明は歴史研究の単位となりうるものであり、全ての文明はみな有機体で、起源・成長・没落・崩壊など幾つかの段階を経ており、世界文明の発展は等価かつ同格で、多様性に満ちていると認識していた⁽³⁾。雷海宗著『世界上古史講義』に明らかにように、雷海宗は世界古代史を国別に講義するという先例を破り、時間に応じて時代を区分し、古代文明の発生と発展を観察するように改め、またさらに古

代文明の発展における環境の役割に非常に強い関心を抱いていた。雷海宗の考えでは、上古世界の重要な五大文明地区のうち、中国・インド・ユーフラテス・エジプトの四地区と、ギリシャ・ローマ地区との最大の相違点は、前者は大河文明で、大河の環境が生産発展と国家形成に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たのに対し、ギリシャには山地や島、港湾があったため、手工業を基礎とする都市国家の建設が容易であった事である。ローマには平原があり、海岸線が垂直に伸びていたために農牧業が重視され、ギリシャとは別の歴史的軌跡をたどった。草原や砂漠では、牧畜あるいは遊牧だけが主要な生産方式であった。このような基礎の下では遊牧世界から奴隷社会への発展は不可能であり、家内奴隷の出現のみが可能であった。また大河流域は土地が広く、人も多いため、奴隷社会の形成は可能であったが、それが高度に発展することも、また長期にわたることもなかった。一方、臨海地区では商工業が発達し、奴隷社会に発展するのに適していた⁽⁴⁾。

マルクス主義が中国に伝わると、史学界でも賛同者が出現した。周谷城は1939年に“歴史完形論”を提出し、歴史とは複雑で統一的な総体であり、各部分は相互に関連し、相互に制約しているとの認識を明らかにした。歴史研究とは、歴史の全体像や完全な形態の研究であり、歴史を支離滅裂で、ばらばらな物にしてはならないと考えたのである。このような思想的指導の下、また複数回にわたる世界史講義の経験から、周谷城は1949年に『世界通史』（三巻本）を出版した。周谷城は、世界史とは国別史の総和ではなく、また歴史研究では世界各国の相互関係に重点をおいて、その有機統一的な全体性を強調すべきだと考えていた。人類とは自然が一定段階にまで発展した産物であり、人類は誕生以来、自然と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合い、相互に利用し合い、相互に進化し合い、交差して発展してきた。人類が自然から離れることは不可能であり、また人類の発展も自然の進化から離れてはありえない。このため、周谷城著『世界通史』では、世界の異なる文化は多元的に並存し、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合い、

共に発展するものとして描かれた。しかし、これらはすべて宇宙の進化、地球の進化、生物の進化および人類社会の進化過程で発生することであり、自然と人類の相互作用の産物であった。

以上の分析からも明らかなように、中華民国期あるい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の建国当初、中国の世界史学者は自らの世界史システムの構築にあたり、歴史における環境の役割を決して無視していた訳ではない。しかし、このような状況は「ソ連という先輩」に全面的に学んだ後、徹底的に変化した。ソ連科学アカデミーの編纂した『世界通史』では、スターリン式マルクス主義の指導に基づいて、すべての国別史を生産方式の五段階進化にあてはめようとしていた。中国の大学での世界史教育と研究は、同書を模範に、全面的にソ連式マルクス主義へと向い、またさらに革命的要素を強めていったのである。

1952年から1980年代中期にかけて、世界史に関する著作のうち、中国史学界で最大の影響力を有していたのは、周一良・呉於廑らの編集した『世界通史』である。同書はソ連版『世界通史』の編纂の構成と叙事模式を参考に、階級闘争は歴史発展の推進力であり、五段階生産方式の上昇は歴史発展の方向であるとして、非常に典型的な目的性を有していた。しかし、このような歴史編纂法には明らかに問題点がある。第一には、五段階の生産方式はヨーロッパ、特に西洋の歴史経験から総括された規律であり、全世界の歴史発展に適合しうるか否か、現在の所まだ確定することが出来ない。第二には、同世界史には中国史の内容が含まれておらず、まるで中国は世界に属していないかのようなのである。この意味で、同世界史は単なる外国史に過ぎないと言えよう。第三に、同世界史では歴史における環境の役割について、まったく論及されていない。ソ連と中国の世界通史はいずれも、環境の役割に注意を払わなくなっていた。それは何故だろうか？ 重要なのは、歴史の編纂はその時代の政治動向に重大な影響を受けている事である。冷戦構造では、社会主義陣営はあらゆる方法を講じて一刻も早い発展を望んでいたが、さらに進んで一挙に共産主義に至るという幻想

をも抱いていた。そこで、一切を顧みることなく、環境を利用し改造することは、進歩の表現であると見なされたのである。ソ連では、スターリンが環境は無用であるとの認識を示した。それは、環境は長い間ほとんど何も変化していないにも関わらず、ロシアは既に五段階の社会制度を経たという理由からであった。スターリンは同時に、環境決定論に対して猛烈な攻撃を加え、同論は人間の歴史の能動性を十分に認識していないばかりか、歴史発展に対する環境の影響を過度に誇張していると見なした。中国では、毛沢東がスターリンの環境論と毛自身の詩人的気質を結合させ、「天と闘い、地と闘い、その楽しみは尽きず」、「人は必ず天に勝つ」などの革命的ロマン主義思想を示した。このような政治的雰囲気の中、環境は自ずと世界史から排除されたのである。

その後、中国では改革開放にしたがって、世界史の編纂は次第に、世界史を縦向きと横向きの双方から結合させた歴史システムや、現代化された世界史システム、世界文明史システムなど、多元化の傾向が見られた。しかし、環境は依然として歴史に組み込まれておらず、人類は依然として自然界から乖離した社会的動物であった。このような状況に変化が生じたのは21世紀以降のことである。例えば、中国では現在“マルクス主義理論の研究・建設プロジェクト”が進められているが、同プロジェクトに基づく世界史の近現代に関する著述では、環境問題および環境主義運動に関する章が設けられている。また現在、盛んに提唱され、様々な試みが行われている地球全史においても、歴史上の種の交流と環境の変遷が非常に重視されている。しかし遺憾なことに、中国では現在の所、世界史に環境の視点を取り入れた、完全な著作はまだ出版されていない。しかし、最近出版された世界史に関する大型の翻訳書では、環境に関する内容がかなり増えている。それは、一つはジェリー・ベントレー (Jerry Bentley) とハーバート・ジエグラー (Herbert Ziegler) による『新地球全史：文明の伝承と交流 (*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であり⁽⁵⁾、もう一つはフェリペ・フェルナンデス・アルメスト (Felipe

Fernandez-Armesto) 著『世界：歴史』である⁽⁶⁾。前者は、文化間の相互作用という視点から人類の文明史全体を分析するもので、人口や種、疾病の交流と環境の悪化など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である。後者は、世界史とは世界が如何にして現在の姿になったかを探求する事であり、世界に対する全体的叙述であると、はっきりと指摘している。同書の二大テーマの一つは環境史であり、人類と人類以外の自然界（その他の種、不安定な自然環境および変動的な地球）の相互作用である。まさに、人間と環境の間の相互作用が根本的に世界史を構成している。それは、我々人類は環境から離れて我々自身の歴史を理解することが出来ないからである。これは決して、環境が我々の行為や生活を決定するという事ではない。しかし環境は確かに、我々の行動に制限を加える。これから明らかなように、著者は環境の歴史における役割を重視しているが、“環境決定論”に陥るのを極力避けている。この二冊の書物は出版後すぐに中国で翻訳、出版されたが、それは中国の読者の要求をある程度反映し、また満足させるものであった。この読者の要求とは、目前の世界的状況を理解し、人類と地球の運命を予言するために、世界史を通じて歴史に対する知識と解釈を学ぶ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以上みてきたように、中国では世界史の編纂において、最初期には環境に関する内容が含まれていたが、後には完全に消滅した。このような変化は、当時の時代精神と密接に関係している。今や、世界と中国の環境問題は既に人類と、人類の生存する地球を脅かしており、時代は環境問題を取り込んだ新しい世界史の出現を必要としている。中国では環境史を融合させ、また海外の研究成果を取り入れた新しい世界史の導入が始まっている。それでは、中国の環境史研究はどのような状況にあるのだろうか。新しい世界史の編纂のため、知識は十分に蓄積されているのだろうか。

二 中国の環境史研究

“環境史”という言葉は、学術名詞としては明らかに輸入品である⁽⁷⁾。中国の学者がアメリカの環境史研究と環境思想史について著述、紹介を始めたのは早くも1990年代の事である。筆者は1995年からドイツで環境史に関する研究を始め、その4年後に北京大学歴史系にて“人類の発展と環境の変遷”という題目で、“簡明な世界環境史”について学部の選択科目講義を始めた。それ以降、大学院では“南アフリカ環境史研究”、“アジア太平洋地域環境史”、“環境史学史”、“環境史文献講読”などの授業を相次いで開講し、“環境史先端系列講座”を設立した。2000年には「環境史：歴史、理論と方法」という論文を発表して、海外の環境史研究について系統的に研究、紹介し、環境史に対する解釈と環境史理論が、新しい世界史の改造と構築に有用であるとの観点を示した。その後、多くの学者が次々と自らの論文を環境史と名付けたり、あるいは自らの関連論文を意識的に環境史の範疇に組み込んだりした。中国の環境史研究は依然として初歩的段階にあるが、既に著しい発展の姿を見せている。

まず、中国の環境史は今や著しい勢いで発展している。環境思想文化、農業環境史、古代都市環境史、自然景観変遷史、疾病史、災害凶作史、西部環境史、森林と環境保護史などの方面で、研究が不断に進められ、大量の研究成果を上げている⁽⁸⁾。横の視点から見ると、国内の地域研究はかなり発達しており、地域を名目とした研究センターも設立された。しかし、全国性や国際性という視野にかけており、現在の所まだマーク・エルヴィン (Mark Elvin)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のような、壮大で叙事性に満ちた著作は書かれていない。また日本の総合地球環境学研究所では、雲南、新疆ウイグル自治区のイリ、そして黒竜江をそれぞれモンsoonアジア、ユーラシア大陸、東北アジアおよびその海域とする超域研究で成果を上げているが、

中国にはそのような成果も無い。ましてや環境史の専門テーマに関する研究を、国際的な関連学科の系譜の上に位置づけ、推進しようという意識は見られない。では、縦の視点から見てみよう。中国の環境史研究では古きを重んじ、新しきを軽んじるため、古代環境史研究においても王朝交代の歴史分期法を踏襲する習慣がある。中国歴史学には、次の王朝が前の王朝の歴史を書き改めるという伝統があり、死後に評価を定めることが好まれる。それは、このようなやり方をすると、自由で客観的な歴史の編纂が可能であり、研究内容と規範がさらに学術性を増すと考えられているためである。しかし現代人が現代史を書き改める場合、現実の影響を受けやすく、率直に書く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中国の環境史研究もまたその例外ではない。しかし、このような歴史の編纂は依然として、伝統的な官僚政治史の型に陥っているため、環境と人類相互の役割の歴史の変遷の法則が疎かになっている。また目前の環境危機に対する直接的な基礎研究が軽視されているため、環境史が警告的かつ教訓的な役割を果たすのは容易ではない。

次に、中国の世界環境史研究は、中国の世界史研究同様に薄弱である。現在までに出版されたのは全部で、海外の環境史専門書2冊⁽⁹⁾と論文集2冊⁽¹⁰⁾である。海外の環境史研究においては、中国の世界史研究全体の気風と同様に、強国あるいは大国に対する環境史や、大国主導の国際的な環境整備システムの研究に重点が置かれている。アメリカやイギリス、日本が研究の重点であり、内容はその環境主義思想史や環境保護運動史、汚染整備と環境政策史、経済発展と環境破壊・整備の関係史などに及ぶ。相対的に見て、アジア・アフリカ・ラテンアメリカなどの発展途上国と地域に対する環境史研究は実際の所、非常に稀である。海外の環境史について研究する事によって、先進国の環境史の経験や教訓に学び、それを手本としたいという要求をある程度は満足させることが出来た。また国際比較研究のための可能性がもたらされた。しかし、世界環境史は一つの総体で、発展途上国の環境史はその構成に不可欠な有機的要素であ

るという学術上の必要性から、あるいは現在の国際的な環境闘争において、発展途上国の協力と支持が不可欠であるという現実上の必要性から見て、先進国の環境史にのみ着目するという不均衡な状況は、すべて必ずや迅速に改めねばならない。国内における研究の不足は、翻訳を通じてある程度、補うことが出来る。ここ数年、中国の学者は海外の環境史に関する書籍を相次いで20部ほど翻訳、出版した⁽¹¹⁾。これらの著作の作者を見ると、ほとんど全員が欧米先進国の出身であるが、内容は決して欧米に限られたものではなく、地球全体を視野に入れた著作も多い。梅棹忠夫の著作はヨーロッパ中心論を覆そうという試みであり、これが日本の文明論に環境史観をもたらす突破口となった⁽¹²⁾。これらの訳書は、中国の世界史教育と研究に環境史の内容を導入するための便宜を図り、中国の世界史編纂者の視野を広げるための基礎知識を提供した。

さらに、中国の環境史研究はいまだ初歩的段階であるが、中国の学者は環境史理論および史学史の探究を意識的に行っている。我々学者は、環境史の定義、中国での環境史の起源、環境史の理論的基礎、環境史の役割などについて、討議を重ねている。議論の焦点は多種多様で、国際的水準からすると“二番煎じ”的レベル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こうした議論は環境史の学問的知識を中国に普及させ、歴史学界ならびに一般大衆の環境史に対する共通認識を向上させるのに、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た。同時に、中国の学者はまた世界の環境史学史を積極的に総括しており、自らの研究あるいは院生指導の折には、国際的な環境史研究の最前線に直接参加し、また環境史研究が全域的に発展することを切望している。だが、一人の学者が世界の様々な国の環境史研究の軌跡を描き出し、総括するのに一体どれほどの困難と問題を伴うかは、容易に想像できよう。しかし、現在の歴史学研究の新たな発展のおかげで、口述史学の方法はかなり完成度合いを高めるようになった⁽¹³⁾。また現代のメディア技術によってデータの伝達速度が非常に向上し、データの真実性が保証されている。そのため文献分析や口述史学、実地研究を組み合わせることで、世界環境史学の研究が可能

となり、スタートの遅れていた中国の環境史学者も国際的な環境史学界への参加が可能となった⁽¹⁴⁾。

世界環境史学史に対する研究を通じて、我々は環境史の研究状況と発展の趨勢について、全面的かつ正確に掌握することが出来るようになった。また世界史に環境史を導入したり、あるいは環境史という新しい思考方法を用いることで、世界史を再構築するための基礎的知識を得ることが出来た。さらに近年来、中国の学者はまた著名な環境史学者を多く中国に招請し、特別講義をお願いしている。私は“環境史先端系列講座”の名の下、これまでにジョン・マクニール (John R. McNeill)、マーティン・メロシー (Martin Melosi)、ヨアヒム・ラドカウ (Joachim Radkau)、周新鐘 (Sing Chew)、井上堅太郎、崔德卿などの各氏を北京大学歴史系に招請し、学術交流を行ってきた。彼らは最新の研究成果をもたらしてくれた。我々は他の国の環境史研究の魅力と特徴を、臨場感をもって感じ、世界環境史を全体的に把握するため参考にすることが出来た。

以上みてきたように、中国の環境史研究の発展は早いものの、依然として初歩的段階にあり、一刻も早く克服すべき問題、例えば理論的基礎の薄弱さや、古きを重んじ新しきを軽んずる傾向、中国を重視し世界を軽視する傾向などが存在している。しかし、翻訳と研究を並行して進め、実証的研究と理論的議論を同時に行うことで、環境史研究は新しい世界史の構築に何らかの貢献を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ろう。また環境史の視点から、中国の世界史研究を新たな高みへと押し上げることも、決して不可能な事ではない。それでは、環境史は新しい世界史の構築に如何なる貢献をすることが出来るのだろうか？

三 新世界史の構築に対する環境史の意義

環境史が研究するのは、人間および人間社会と、それ以外の自然との歴史的関係である。この定義を理解するにあたり、注意すべき点が二つある。第一は、

ここでいう所の人間とは個体としての人間であり、またグループとしての社会的人間である。以前の歴史研究では、歴史は人間の歴史であるとして、人間の社会性を過分に強調し、自然界の一部を構成する生物としての属性は軽視されていた。ディープエコロジー学派の勃興後は、人間の生物性が過分に強調され、人間はその他の生物と同等であるとして、他の生物とは異なる人間の社会性は疎かにされた。実際の所、人間は自然界の一員ではあるが、特殊な一員である。その特殊性は人間の社会性に集中的に表現されている。しかし、人間はその生物性を無視できる程には特殊ではない。第二に、ここで“それ以外の自然”が強調されているのは、その中にシステム論や有機体論という思想が含まれているからである。システム論とは、人間と自然を一つのシステムと見なし、人間と自然を対立させる二元論や還元論に反対する思想である。有機体論では、地球は個々の異なる部分が相互に作用して構成された有機体であり、この有機体を構成する各部分は（機械的ではなく）有機的に連携しているだけではなく、それぞれが内在的価値を有した不可欠な存在である。内在的価値（intrinsic value）とは、人間の価値に相對するものではなく、道具的価値（instrumental value）に等しいものでもない。このため環境史では、単純に人間を中心とするのではなく、また完全に生態系を中心ともせず、人間および人間社会と、それ以外の自然との相互作用を中心とするのである。

環境史は狭義の環境史と広義の環境史の二種類に分ける事が出来る。狭義の環境史とは、人間と環境の相互作用という枠組みの下、歴史研究の欠落部分を補うというものである。広義の環境史とは、歴史の発生主体が「人間」から「人間と環境」に変化するという前提の下、新しい歴史を改めて認識し、構築す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る。歴史は人間が創造したものではない。歴史の創造に参加した、あるいは歴史という大がかりな芝居に出演したと言えるのは、自然のような、人間以外の要素である。人間とそれ以外の自然の相互作用という前提に立つ以上、なぜ歴史の創造における人間の役割だけを認め、自然の役割は認めな

いのか？さらに言うならば、脳科学研究で明らかにされたように、人間の行動の大部分は理性ではなく直観によるものであり、決して意識的に行われた事ではない。この直観は、かなり動物的なものであり、人間に特有のものではない。それでは、人間の直観が歴史を創造できたのに対し、動物の直観はなぜ歴史を創造できなかったのだろうか？アメリカの環境史学者ウィリアム・クロノン（W. Cronon）は、次のように指摘する：“人類は決して、歴史を創造する上での唯一の演じ手ではない。その他の生物や自然の発展過程はすべて人類と同様に、歴史を創造する能力を有する。もしも歴史の編纂にあたり、これらの能力を軽視するならば、おそらく読者を失望させるような不完全な歴史が描き出されることだろう⁽¹⁵⁾。” また反対に、全面的かつ総体的な歴史を描き出したいと望むのであれば、我々は人類が歴史を創造したのだと考えるだけではなく、歴史の創造過程において、自然のその他の要素が果たした役割についても認めるべきである。このため、環境史研究による多種多様な知識は当初の知識の限界を超越し、我々の基本的な歴史的思惟を改め、我々に新たな歴史をもたらすのである。

具体的には、もし環境史研究を傘状の構造と見なすならば、一般的にその傘の下に四つのテーマが含まれねばならない。第一のテーマは、環境の変遷過程である。ここで言う「環境の変遷過程」とは自然史で言う所の「環境の変遷」ではなく、「人類の影響下での環境の変遷」に重点を置いたものである。この方面の事柄は、伝統的な歴史資料にはあまり記載されておらず、またさらに環境の機能およびその運行メカニズムを疎かにすることが出来ないため、こうした内容については自然科学上の根拠と方法を利用すべきである。第二は経済あるいは物質の環境史である。ここでは、人類の経済活動、特に手段や技術などの生産方式の変化と環境の相互関係を強調する。アメリカの環境史研究では、この領域は農業生態史および都市環境史という二つの異なったモデルを生み出している。環境史学者は、この両者の間の溝を越える方策を真摯に考えねばな

らない。第三は政治環境史である。主要な研究は、権力関係が環境に及ぼした影響ならびに環境問題による政治変化である。例えば、集権制と分権性が環境に及ぼす影響の相違や、環境立法に関する国会での論争、また環境主義運動や緑の党の政治などである。この第三のテーマは、環境史研究が始まった当時、最も盛んに研究されたテーマである。第四のテーマは文化・知識環境史である。主として、人類が環境をどのように認識してきたか、また逆に人類が環境に適応し、環境を利用する際に、人類の環境認識は如何なる影響を及ぼしたかという点について研究する。そのうち、最も多く研究されているのは、おそらく宗教と環境、文化に対する認識であろう。以上の四つのテーマは、研究重点は異なるものの、一つの研究の枠組みを形成し、環境・経済・政治・文化という四つの次元で相互に関連している。この四つの次元には、共通の特徴がある。例えば、これらは人類と自然のその他の要素の相互の役割を強調するが、そこには人類の環境に対する役割だけではなく、環境の人類に対する役割も包括されている。またいずれも、他の次元との間の有機的関連を重視している。

国際的学術界では、環境史を通じての世界史の改造という試みが既に始められている。現在まさに構築中の新しい世界史は大きく以下の四つに分類される。第一は“世界史 (World History)”である。それはまた、二つの流派に分けることが出来る。一つはベントレー (Jerry H. Bentley) の提唱する流派であり、もう一つはマクニール父子に代表される流派である。父のウィリアム・マクニール (William H. McNeill) は、人類を主体とする世界史を研究したが、環境史のテーマも重視していた。息子のジョン・マクニール (John R. McNeill) は元々、著名な環境史学者であったが、彼の研究内容は西アジアを除く世界全体に及んでいる。マクニール父子が共同で執筆した“*The Human Web*”には環境史的内容や思惟様式が多く記されている⁽¹⁶⁾。相対的に見て、ベントレーの著作には環境史に関する内容はあまり多くはない。しかし、ベントレーは私との直接の談話や通信の中で常に、この新しい思惟様式を意識してはいるが、

まだ完全な解釈や普遍的な承認を得てはいないので、通史に書き入れるのは時期尚早であると述べている。2009年の“北京論壇”で、ベントレーは環境史に関するマクロ研究の成果を発表している⁽¹⁷⁾。

第二類は“ビッグヒストリー (Big History)”であり、その代表的人物はフレッド・スパイアー (Fred Spier) とデイヴィッド・クリスチャン (David Christian) である⁽¹⁸⁾。彼らの編纂する歴史は、137億年前に発生した“ビッグバン (The Big Bang)”以来の歴史であり、実際には宇宙と地球の歴史である。宇宙の歴史が13年前に始まったと仮定すると、人類の存在はわずか53分であり、農業社会は高々5分、現代の工業社会は6秒に過ぎない。歴史研究における視点が変化すると、歴史認識に変化が生じ、我々は地球全体の変遷過程において、人類の歴史は実際の所とても短く、些細なものだと理解することが出来る。“ビッグヒストリー”が出現したことで、地球全体の環境問題を解決するための新しい思考方式と叡智がもたらされるかもしれない。

第三は“地球全史 (Global History)”である。ここで論じているのは、スタブリアノス (L. S. Stavrianos) の言う所の“地球全史”ではなく、ブルース・マズリッシュ (Bruce Mazlish) に代表される地球全史である。その核心概念は地球全体主義であり、第三世界の歴史と地球全体の環境問題をかなり重視し、地球全体主義によって地球全史を総括しようという考えである。しかしベントレーの考えでは、マズリッシュは“*Conceptualizing Global History*”という論文集を編集したに過ぎず、確かに多くの価値ある理論的思考や構想を提示はしたが、自らの基本思想を貫くような体系的地球全史は未だ執筆していない。しかし、ポメラantz (Kenneth Pomeranz) が近年、地球環境史の方面で非常に大きな成果をあげている⁽¹⁹⁾。

第四は“世界システム史”である。我々がよく知っているのは、ウォーラー・ステイン (Immanuel Wallerstein) の500年世界システム論である。しかし、この理論を支持するグループの中で分裂が起こり、フランク (Andre Gunder

Frank) に代表される学者らが5000年世界システム論を打ち立てた。前者が特定の資本主義の世界システムであるのに対し、後者には地理学上の概念的な部分が多く、我々が現在言う所の地球全体史に近い。5000年世界システム論はまた二つの流派に分かれる。一つはフランクを代表とするもので、基本的に人類を中心とした5000年の世界システムである。フランクの考えでは、世界経済とシステムは決して生態系統や宇宙とは別に独立して存在するものではなく、両者は確実に相互に関連し、生態中心主義へと進んでいく。しかし、残念なことに理論分析や実践を行うには、まだ概念的に完成されていない⁽²⁰⁾。もう一つの流派は、環境を基本的な出発点として世界システムを組み立てるというもので、その代表的人物は周新鐘 (Sing C. Chew) である。周はこれまでに、同システムを構築する三部作を出版しており、緑化という方法論に基づいて、5000年世界システム理論をより深みのあるものとした⁽²¹⁾。

環境史の本質と前述の初歩的实践から明らかなように、環境史は新しい世界史の構築のために新しい視点や思惟様式、技術を提供し、以前の世界史編纂上の難点を克服するための助けとなりうるであろう。第一に、環境史は世界史の編纂に根強く見られる人類中心主義の傾向を根本的に克服するのに役立つ。環境史では、人類と環境のその他の部分の相互作用の歴史を研究する。人類以外の環境を歴史的主体としない世界史は、明らかに不完全な歴史である。時間的スパンという観点から見て“ビッグヒストリー”という思惟様式を受け入れるならば、これまでの世界史で中心をなしていた人類史は、歴史全体の中ではほんの一瞬である。我々は歴史に対する、これまでの偏狭で傲慢な態度と認識を徹底的に改めねばならない。

第二に、環境史は進歩史観の不備を改めるのに役立つ。進歩史観は強烈な目的性を帯びており、ヨーロッパ中心論や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一定の共犯関係にある。環境史は、環境の各要素の内在的価値を強調することで、世界に様々な文明が存在することの合理性を証明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環境史的思惟か

らすると、文明の優越性は人々が以前に慣れ親しんでいたヨーロッパ人の基準と完全に一致することはない。それは、むしろその文明の存在する環境とうまく適応しうるか否かによる。こうした意味から、欧米の文明はアフリカなどの文明よりも高度であるという、以前には定説化していた考えが正しいとは決して言えないのである。

第三に、民族国家を基本単位として世界史を編纂するという問題の解決に、環境史は有用である。以前の世界史あるいは地球全史では共に、世界を一つの総体と見なすと公言し、甚だしくは月から地球を見るという説もあった。しかし、実際には民族国家の束縛から逃れることは出来ず、ついには幾つかの主要国家の歴史を一つの皿に盛り合わせたような状態になった。環境史では総体論と有機論を重視しており、環境の各要素間の相互作用を強調する。そのため、どのような問題の認識においても、環境史では生息環境や生態区、地球全体の環境などのレベルから論を展開しており、民族国家はもはや歴史認識を阻害する障壁にはなり得ないのである。

第四に、世界史は環境史によって、人類社会と環境の変遷のルールを一本化する事が出来る。伝統的な世界史の編纂では、五種類の生産方式の変遷に着目するか、あるいは文明相互間の往来に重点を置いていた。社会発展と自然環境は完全に分離し、人類社会だけが重視され、自然環境はほとんど無用の存在とされていた。しかし、現代の環境主義運動と環境史の新たな進展によって、人類および同社会は地球環境から離れて発展する事は不可能であり、人類社会の発展ルールは最終的には自然のルールに従うしかない事が分かった。環境史によって、自然環境も人類社会も複雑さや規模の絶え間ない拡大のプロセスを経験しているが、その最も重要な原動力は人類のデータ収集・伝達能力の向上であり、その背後で力を発揮しているのはエネルギー移動の熱力学の法則である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

以上、例え環境史研究を歴史学の一つの流れ、あるいは多学研究の領域と

見なすとしても、環境史研究の最も本質的な貢献は一種の新しい歴史的思惟を提供しようという点にある。このような思惟様式は、伝統的な歴史本体論や認識論を再認識し、以前の世界史編纂の問題点や不備を認識するのに有用であり、またさらには新しい世界史を構築する上でも有利である。このような新しい思惟様式に基づいて構成された、満足のいく世界史は現在の所、依然として描かれていない。しかし近い将来、必ずやこのような新しい世界史が出現すると信じている。

中国の世界史と環境史の研究はいずれもスタートが遅かった。世界史の編纂は、時代の急激な変遷から強烈な影響を受けている。中でも最も明白な影響の一つは、世界史における環境の地位の変化である。環境史研究は国際的には相対的にかなり安定し、開放的な状況で行われているが、中国の歴史研究では中国固有の特徴が余す所なく表現されている。もし中国が国際的な世界史編纂の潮流に従うならば、中国の環境史研究には新世界史の編纂に十分な知識や思惟様式を提供するだけの蓄積は依然として不十分であると認めざるを得ない。しかし知識には国境がなく、国際環境史研究は既に新しい世界史の構築のために方向性と麗しい未来を示している。中国の若き世界史・環境史学者は、広範な国際的学術協力を通じて、新しい世界史の創造という時代の潮流に参加しようのである。

- 1 梅原猛、伊東俊太郎、安田喜憲総編集、講座『文明と環境』第1-15巻、朝倉書店、1995-1996年。安田喜憲『文明の環境史観』中央公論新社、2004年。池谷和信編『地球環境史からの問い ヒトと自然の共生とは何か』岩波書店、2009年。
- 2 林同済、雷海宗『文化形態史観』、大東書局、1946年。
- 3 雷海宗『世界上古史講義』、1953年（謄写版）。後に、王敦書が整理し、『西洋古代史綱要』という書名で、上海古籍出版社から2001年に正式に出版した。
- 4 王敦書「雷海宗の環境史観と環境史学」、『史学理論研究』、2009年第二期。

- 5 Jerry Bentley・Herbert Ziegler, *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 3rd edition,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2005. 傑里・本特利, 赫伯特・齊格勒 著, 魏鳳蓮, 張穎, 白玉広 訳『新全球史: 文明的伝承と交流』,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 6 Felipe Fernandez-Armesto, *The World: A History*, 2nd edition, Pearson Education Asia Limited, 2003. 菲利普・費爾南德茲——阿邁斯托 著, 葉建軍, 慶學先 等訳『世界: 一部歴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
- 7 これは、中国ではそれ以前から「環境史」という名称こそ用いられていないものの、実際には既に豊富な環境史研究の内容と成果が存在していた事を否定するものではない。
- 8 参照 Bao Maoho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China”,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10, No.4: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China (2002-2007)”,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Pusan, South Korea), Vol.3, August 2007.
- 9 侯文惠『征服的挽歌——美国環境意識の変遷』, 東方出版社, 1995年。包茂紅『森林与發展——菲律賓森林濫伐研究』, 中国環境科学出版社, 2008年。
- 10 梅雪芹『環境史学与環境問題』, 人民出版社, 2004年。包茂紅著, 北川秀樹 監訳『中国の環境ガバナンスと東北アジアの環境協力』, はる書房, 2009年。
- 11 弗・卡特, 湯姆・戴爾『表土与人類文明』中国環境科学出版社, 1987年 (V.G. Carter, T.Dale, *Topsoil and civilization*. / 邦訳 V.G. カーター, T. デール, 山路健訳『土と文明』家の光協会, 1995年)。古迪 著, 鄭錫榮等訳『人類影響——在環境變化中人的作用』中国環境科学出版社, 1989年 (Andrew Goudie, *The Human Impact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卡若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婦女, 生態和科学革命』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年 (Carolyn Merchant, *The Death of Nature*. / 邦訳 キャロリン・マーチャント著, 団まりな・垂水雄二・樋口祐子訳『自然の死: 科学革命と女・エコロジー』工作舎, 1985年)。菲利普・沙別科夫著, 周律, 張建發等訳『滾滾綠色浪潮——美国的環境保护运动』中国環境科学出版社, 1997年 (Philip Shabecoff, *A Fierce Green Fire: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 邦訳 フィリップ・シャベコフ著, さいとうけいじ・しみずめぐみ訳『環境主義: 未来の暮らしのプログラム』)。彭慕蘭『大分流: 欧洲, 中国及現代世界經濟發展』,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3年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斯蒂芬・J・派因, 『火之簡史』, 生活・読書・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 (*Fire, A Brief History*)。唐納德・沃斯特『自然的經濟体系: 生態思想史』商務印書館, 1999年 (Donald Worster, *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克萊夫·龐廷『綠色世界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 (Clive Ponting, *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ollapse of Great Civilization*)。唐納德·沃斯特『塵暴: 1930年代的美国南部大平原』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3年 (*Dust Bowl, The Southern Plains in the 1930's*)。約阿希姆·拉德卡『自然與權力——世界環境史』河北大學出版社, 2004年 (Joachim Radkau, *Natur und Macht: Eine Weltgeschichte der Umwelt*)。艾爾弗雷德·W·克羅斯比『生態擴張主義: 歐洲900-1900年的生態擴張』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1年 (Alfred W.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 『哥倫布大交換——1492年以後的生物影響和文化衝擊』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2010年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 『人類能源史——危機與希望』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9年 (*Children of the Sun: A History of Humanity's Unappeasable Appetite for Energy*)。賈雷德·戴蒙德『槍炮, 病菌與鋼鐵: 人類社會的命運』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0年 (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 『崩潰: 社會如何選成敗攻防』(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ll or Succeed),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8年。威廉·H·麥克尼爾著, 余新忠, 畢會成譯『瘟疫與人』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2010年 (*Plagues and Peoples*)。布賴恩·費根著『洪水, 飢饉與帝王: 厄爾尼諾與文明興衰』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9年 (*Floods, Famine, and Emperors: El Niño and the Fate of Civilization*)。梅棹忠夫著, 王子今譯『文明的生態史觀』上海三聯書店, 1988年 (『文明的生態史觀序說』)。威廉·貝納特, 彼得·寇茨著, 包茂紅譯『環境與歷史: 美國和南非馴化自然的比較』譯林出版社, 2008年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The Taming of Nature in the USA and South Africa*)。

12 包茂紅「日本文明論的環境史觀」, 『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0年1月28日。

13 筆者はいまだに、多くの国際的に著名な環境史学者にインタビューを行い、その記録を発表してきた。これはアメリカの“Environmental History”誌上の同様なインタビューよりも、少なくとも4年は早い。例: 「唐納德·沃斯特 (Donald Worster) 和美国的環境史研究」, 『史學研究』2003年第4期; 「中国環境史研究: 伊懋可 (Mark Elvin) 教授訪談」, 『中国歴史地理論叢』2004年第1期; 「熱納維耶芙·馬薩-吉波 (Geneviève Massard Guilbaud) 教授談法國環境史研究」, 『中国歴史地理論叢』2004年第2期; 「馬丁·麥塞西 (Martin Melosi) 与美国城市環境史研究」, 『中国歴史地理論叢』2004年第4期; 「亞克西姆·納得考 (Joachim Radkau) 教授談德國環境史研究」, 『史學月刊』2004年第10期; 「一个巴西環境史学家的拉美環境史研究體驗」, 『學術研究』, 2009年第6期。

- 14 筆者が発表した関連論文だけでも、以下のようなものがある：「環境史：歴史、理論与方法」、『史学理論研究』2000年第4期；「非洲史研究的新視野——環境史」、『史学理論研究』2002年第1期；「南非環境史研究概述」、『西亜非洲』2002年第2期；「美国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中国學術』2002年第4期；「英国的環境史研究」、『中国歴史地理論叢』2005年第2期；「東南亜環境史研究述評」、『東南亜研究』2008年第4期；「澳大利亜の環境史研究」、『史学理論研究』2009年第2期；「拉丁美洲環境史研究」、『學術研究』2009年第6期；「國際環境史研究的新動向」、『南開學報』2010年第1期；「印度的環境史研究」、『史学理論研究』2010年第3期。
- 15 W. Cronon, “The Us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Vol.17, No.3 (1993), P.18.
- 16 J. R. McNeill & William H. McNeill, *The Human Web: 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
- 17 Jerry Bentley, “Why study world history?”, *World History Connected*, Vol.5, No.1, 2008. Jerry Bentley, “Environmental crises in World history”, *Beijing Forum*, November 6, 2009.
- 18 Fred Spier, *The Structure of Big History: From the Big Bang until Today*,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6. David Christian, *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 19 Edmund Burke III and Kenneth Pomeranz (eds.), *The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 20 A. Frank & B. Gills (eds.), *The World System, 500 Years or 5000 ?* London, 1993. A・弗兰克著，劉北成訳『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央編訳出版社，1999年，第16頁（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 21 Sing C. Chew, *World Ecological Degradation: Accum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Deforestation 3000 B. C.-A. D. 2000*, Altamira Press, 2001；*The Recurring Dark Ages: Ecological Stress, Climate Changes, and System Transformation*, Altamira Press, 2007；*Ecological Futures: What History can teach Us?* Altamira Press, 2008.

